

陳光誠是美遏華一棋子

□魏紹光

面對近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在硬實力方面主要是依靠所謂的「重返亞太」，加強在西太平洋地區與日、韓、澳等國的雙邊同盟關係，同時挑動一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摩擦，以制約和防範中國。當然，美國也自知亞太地區的國家不會為美國火中取栗，不會完全跟着美國的指揮棒轉。因此，還要用軟實力，在價值觀、人權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分化與瓦解。其方法，一是通過各種途徑加大對中國進行價值觀的輸出與滲透；二是利用中國處於改革攻堅期、社會矛盾凸顯期這樣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存在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境內尋找和扶持一些能為美國所用的代理人，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用中國人打中國政府，以製造和擴大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打壓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在民衆中的形象。這樣的代理人成分很複雜，其中所謂的「維權人士」如陳光誠等人是一個重點人群，原因是這些人的遭遇最能反映中國各級政府施政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最能獲得中國民衆的同情，也最容易讓美國站到道德高地。筆者相信，在這類人中，陳光誠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陳不是普通維權人士

陳光誠已從一個普通的維權人士異化為美國分

化和遏制中國的一個棋子。在中國當前所處的改革攻堅期、社會矛盾凸顯期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社會矛盾凸顯加上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不到位，人們對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手段有意見和看法是完全正常。因此一些有一定膽識和能力的人出來為民衆的利益鼓與呼，人們是支持的。事實上，陳光誠早年在維護殘疾人權益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確實也得到了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隨着陳光誠的知名度越來越大，其本人也逐漸飄飄然，日益熱衷於與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外國媒體打交道，熱衷於獲得境外各種各樣的名譽和獎勵。然而，以陳光誠這樣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盲人的知識水平和見識，對這些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媒體以及各類授獎機構的政治背景、政治動機未必有什麼深入的了解，他在飄飄然中就自覺不自覺地落入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掌心，成了美國遏制中國的一個棋子。

事實上，陳光誠已經被美國人養起。內地網民指出，陳光誠夫婦作為農民，長期以來既不種地，也不做工，沒有合法收入，但日子卻過得很滋潤。最近露面的陳光誠，紅光滿面，意氣風發，指點江山，和被真正長期軟禁的昂山素姬判若兩人。而且他這幾年接受外國資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因此，

陳光誠投桃報李，他的一舉一動時刻都附着某種利益的需要，發揮着獨特的功能。

最終要令美國人失望

陳光誠個人素質不高，終將會成美國人的負資產。所謂其素質不高，一是陳光誠根本就沒有攻讀過法律專業，沒有參加過律師資格考試，不具備律師資格，缺乏律師應有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他充其量只具有一些零星的法律知識。據說美國的一所大學要邀請陳光誠去做訪問學者，他不懂英語，也不懂普通話，如何做學問搞研究？二是陳光誠誠信有問題。例如，陳光誠離開美國駐華大使館後說，他是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人員告知他假如不離開美國大使館，他的妻子就會被打死的情況下才離開大使館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隨即對陳光誠的這種說法予以否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美國使館沒有人對陳光誠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官員也沒有要求美國方面向陳光誠傳達這樣的話」。

事實上，陳光誠本質上只是一個有一定膽識和能力的中國「鄉村能人」，但在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的過分宣傳下，陳光誠儼然已經成了維護中國人權的一面旗幟。然而，陳光誠無論是知識結構，還是道德品行，根本就不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他終究是要令美國人失望的，會成為美國的負資產。一個人離開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仰人鼻息投靠外國人，他在這條路上能走多遠，其踏上美國國土後，利用價值被榨乾之後，結局如何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重組新架構 施政更高效

□王惠貞

只有一個科學、合理與時俱進的政府架構，才能確保高效施政的公務員團隊與社會和諧、繁榮、進步的持續發展。候任特首重組後的政府新架構，是一個科學、合理與時俱進的制度性安排，相信會有助於新政府提升管治效能、強化夥伴機制、高效依法施政。



科學、合理與時俱進的政府架構，是保障一個政府高效、有為、順利依法施政利國利民的首要條件。只有一個科學、合理與時俱進的政府架構，才能確保高效施政的公務員團隊，也才能確保社會和諧、繁榮、進步的持續發展。候任特首重組後的政府新架構，由過去的「三司十二局」改組為「三司十四局」，包括新設二名副司長，新增一個文化局，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分拆為科技及通訊局和工商及產業局，並對多個政策局職能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尤其是統一地政和房屋架構的安排，我們認為是一個科學、合理與時俱進的制度性安排，相信會有助於新政府提升管治效能、強化夥伴機制、高效依法施政。

施政理念以民為本

近年來，本港政制爭拗屢見不停，令經濟與社會面對各種衝擊，社會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求變、求和諧、求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最強音。各階層市民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希望有一個高效、廉潔、強勢的新政府，可以帶領香港重新出發，再次高飛。正如梁振英先生在電台中所講的「我們不能再吃老本，必須要有新發展」。因此，如何順應民意，回應社會的求變期待，自然成了一個有承擔、有遠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候任特首在其參選綱領中提出了「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以回應大環境的變化，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市民是讚賞與認同的。

所謂穩，新架構保留了原架構的結構，三司十二局完全保留，未減一司一局。所謂變，只是在原架構的基礎上做了小小調整，這些調

整是合理的，與時俱進的。例如廣大市民最關注的房屋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方面規劃由發展局制定，但執行實施時則去到運輸及房屋局。由於兩者分開在兩個不同的局進行，在溝通上肯定不會像在同一個局內溝通來得快及暢順。這一相應合理的調整，體現了新特首「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

新的政府架構中，新增文化局，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分拆為科技及通訊局和工商及產業局，是因應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把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改組為房屋規劃及地政局和運輸及工務局，更理順了所屬關係有利施政。

新架構具民意基礎

大家有目共睹，梁振英先生在競選過程中不斷走訪不同界別與社會人士，並聽取了社會各階層的意見，他當選後，仍然繼續落區並接見不同界別人士聽取意見。新架構基本上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訴求，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新架構中將房屋、規劃及地政統一管治，十分有利於房屋政策的推行與落實，將大大加快緩解長期以來住屋貴，住屋難的現象，完全迎合了普通市民的訴求，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這方面我們有很深的感受經驗。當年九龍社團聯會在參與啓德發展新區諮詢時，由於政府部門分工繁雜，同一類工作隸屬多個部門，房屋、地政、規劃、運輸，我們找完發展局表達意見後，他們又讓我們找運輸及房屋局，令到我們東奔西跑無所適從，後來在我們的建議下，政府設立了一個跨部門專員，令問題即刻簡化，許多過去拖而不決的問題得到迅速解決。新架構還有文化局與科訊局的設立。對國家來說，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曾幾何時，香港的影視歌等文化產品風靡世界，文化產品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但今時今日，香港的文化產品卻風光不再，漸形式微。如

何重新整合發展香港的文化產業，實在需要一個獨立的文化政策部門去統籌去發展。而科訊局的設立亦是科技界的宿願，此舉必將有助於香港創意產業及高科技工業的長足發展。

無縫銜接有利民生

如何與內地全方位對接，如何推動「十二五」規劃，如何進一步落實 CEPA，將香港的經濟帶入新的起飛跑道，一直是業內及有識之士操慮的問題。新政府在原本二司的基礎上，增加兩個副司長，專職人口、扶貧及產業政策，尤其是專責「十二五」規劃及 CEPA 等工作，從政策負責層面解決了業內人士的擔憂，十分正確。

從梁振英的施政綱領及用人理念看，他提倡的新老架構結合，公務員與專業精英結合，都體現了「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這種新老結合的架構及公務員與專業精英結合的管治班底，都將令新政府、新政策具有較強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有利於加快決策過程的運作，提升施政效率，改善服務質素，強化政府權威，更加適應香港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新老架構結合，公務員與專業精英結合，可以講是新舊特區政府的無縫銜接，是「穩中求變」的具體實踐，有利民生與經濟發展，是市民喜聞樂見的。而新理念新架構能否順利實施，還有賴於各方合作與支持。我們不希望本港的民生服務及經濟發展好像港澳大橋般再次受到無謂的拖累，令市民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梁振英先生當選後，仍然繼續落區聽取各界人士意見，如此善聽民意，敢於承擔的候任特首，我們沒有理由不與之合作、不支持其依法施政。當然，任何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實踐檢驗而逐步完善，我們應毫不猶豫地給他這個實踐的機會，令他的施政理念得以實現。

作者為九龍社團聯合會理事長

防止流會才是為民請命

□希爾

堅持對話保半島和平

□延靜

朝鮮半島局勢近日稍微安定下來，由朝鮮發射衛星引起的風波基本過去。當然，朝鮮會不會第三次進行核實驗，仍然引人關注。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說，沒有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的具體證據。但願果真如此。

中國歷來致力於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歷屆領導人不止一次闡明過這一立場。處理與朝鮮半島有關問題，我們的原則是，看如何做才能有利於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中國贊成朝鮮半島實現無核化，在北京六方會談中勸和促談，正是出於這一考慮。

朝鮮半島的格局與過去相比，已發生了重要變化。截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十年期間，這裡還是南北尖銳對峙的格局，美國和日本支持一方，中國和前蘇聯支持另一方，互不承認，不相往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朝鮮半島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九九〇年前蘇聯與韓國建交和一九九二年中國與韓國建交，徹底改變了冷戰時期這一地區的局勢，有關朝鮮半島各方出現了一個新的態勢和格局。中韓建交後雙邊關係發展迅速，俄韓關係這一時期也有新的發展。美國和朝鮮之間打破了幾十年的隔閡，開始接觸、會晤、會談、互訪；日本和朝鮮之間也開始接觸。朝鮮半島這盤棋從此走活。

分裂幾十年的朝鮮南北雙方，也打破了相互敵視和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出現了新的氣象。特別是二〇〇〇年，金大中總統訪問平壤，與金正日委員長舉行首腦會談，開啓了南北關係歷史性的新一頁。首腦會談後，南北之間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廣泛的交流，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金剛山旅遊也隨之開展起來。當然，南北交流中也遇到一些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交流與合作對南北雙方都有好處不言而喻，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使南北人民都比較安心。

不久前，由於朝鮮宣布發射衛星，引起各方與輿論的強烈反應。其實，朝鮮衛星發射，雖有對外顯示「強盛大國」之需要，但主要是為了慶祝金日成百歲誕辰，鞏固金正恩新領袖的地位。在朝鮮半島局勢剛剛消弭，美韓又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此舉顯然不利於半島局勢的穩定。當然，朝鮮半島問題複雜敏感，涉及各方切身利益，非短期可以解決。但六方會談是實現和平與穩定的有效途徑，希望各方早日回到對話與協商談判桌上來。

作者為中國資深外交官



春季以來，中國改革呼聲雀起。相信隨着中共「十八大」臨近，這種呼聲還會繼續升溫。不過，筆者要實事求是地說，與三十多年前中國改革初始時期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相比，對本次即將到來的改革，社會輿情和公眾的反映卻十分不同。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一定還有印象：中國公眾中的絕大多數對1978年以後和1992年之後的兩次改革高潮，都是持擁護態度的。為何？因為那是兩個解凍後的春潮不斷湧動的時期，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但追求富足的晨光已初顯的時期，是解除了各種精神禁錮與羈絆走出彷徨的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社會矛盾尚不突出、改革之路相對平坦的時期，也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執政群體在治國理政把握國內外外交的能力最為成熟老練的時期……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就使那兩次的改革高潮到來時，人們的渴望與慾望得到了正常宣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基本趨於一致，從而使全社會有了較強的承受能力。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公眾對改革的支持率自然會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公眾對改革態度轉變

然而到了今天，公眾對改革的真實態度卻與上述兩個時期迥然不同。如果我們能夠正視現實，就應該看到，今天改革的聲譽已受到了損害。有相當數量的公眾往往會開改革之議，而起狐疑之心。這說明在他們眼裡中國改革的含義正悄然發生了變化

各地城鄉不斷發生的大大小小的群體抗爭和社會對峙事件，「仇富仇官」心理與「追富求官」心態的矛盾與並存，都說明多數國民對現有的財富和權利的格局並不認同。改革的成就、國家實力的增強，與百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相當大的反差。

那麼，公眾對改革的失望與冷漠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換句話說就是人們的改革銳氣和熱情，又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問題上被無情地閹割和遇冷的呢？

筆者淺見，如下四個方面甚為重要：一是由於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過大，使很多人較少或沒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心理嚴重失衡；二是中國社會管理功能在國家迅速走向城鎮化的進程中極不適應，顯得相形見绌、水平低下，致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呈現出混亂無序狀態。這種紊亂狀態使公眾的實際利益不斷遭到侵擾；三是權錢交易嚴重，貪腐現象愈演愈烈，以致上行下效，民敗與官腐並存，多數人的生存成本大大增加，甚至感到入不敷出；四是拜金主義盛行，舊日良好的倫理道德風尚受到極大衝擊，新的市場信用體系鬆弛，商品生產與交換中的誠信約束所剩無幾。這就是目前為中國公眾和輿論界詬病最多的四個方面。

那麼，導致前述四大問題出現的背後深層次原因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就改革而言，主要是在方向和路徑上出現了一定的迷失，至少是目標上發生了模糊和游移。而要克服這種迷失、模糊和游移，重新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事業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須調整改革的「準星」，要真正用最廣大公眾的普遍意願作為標準來認真校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才有可能尋找到破解上述各類社會經濟問題的辦法，也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可以統領各項具體改革舉措，理清中國未來發展目標和思路的所謂

的「頂層設計」。在這裡，筆者想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朱德針對當時中共黨內和紅軍內部只顧「擴紅」（即擴大紅軍）卻無視群眾生活，把所謂的「革命利益」置於群眾切身利益之上的錯誤思想，提出了嚴肅批評。他說：「諸位同志哥恐怕忘記了這樣一個道理：革命究竟是為啥子嘛。我們是為了群眾而幹革命，不是為了革命而去找群眾。革命和老百姓，這個次序可不敢顛倒喲！」我以為，當年的朱軍長後來的朱元帥這段極樸實的語中所包含的道理，對於今天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也完全適用。中國的改革家和他們的智庫與智囊人物都應該懂得：三十多年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健康力量之所以力推改革，是為了天下蒼生為了一個民族擺脫貧困走向復興，而不是為了求得一黨一派一人的萬古留名。改革絕不是為了讓少數人成為吸金機器，而使多數人嗷嗷待哺。

須重新贏得公眾信任

可見，為什麼人「服務」是一個根本問題，也是一切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根本出發點。鄧早已多次指明、多次宣示：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是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標準。因為只有人民的實踐才是社會主體的實踐，人民的檢驗與評判其實就是生產力的檢驗與評判。為人民服務，說到底也就是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服務。如果說，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那麼，弄清為什麼人服務大概就是這「頂層」中的最高一層。因此，筆者以為認真總結經驗與教訓，校正改革的方向，是重新喚起公眾熱情，贏得公眾信任，實現中國未來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